

研究論文

從職業教育到愛國報國教育： 香港早期新聞教育研究(1927-1949)

劉書峰

摘要

香港最早的新聞培訓機構香港新聞學社於1927年開辦，隨後又有生活新聞學院、香港中華業餘學校新聞科、香港中國新聞學院、達德學院新聞專修科、民治新聞專科學校香港分校等出現。香港早期的新聞教育多是提供短期職業培訓，授課教師名流薈萃，均是當時在香港的較為資深的報人和知識份子，課程安排一直重視培養學生實際動手能力。香港淪陷前，新聞教育從慘澹經營到熱情高漲，淪陷後被迫停辦。戰後，香港新聞教育在中共及左翼知識份子的倡議和組織下再度興起，直到因「宣傳政治」而被港英政府勒令停辦。

關鍵詞：香港早期報業、新聞教育、職業教育、愛國報國教育

劉書峰，中國傳媒大學中國廣播電視年鑒編輯部副編審。研究興趣：新聞傳播史、廣播電視、港澳新聞傳播史。電郵：chinaliu@cuc.edu.cn
論文投稿日期：2015年8月15日。論文接受日期：2016年6月14日。

Research Article

From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o Patriotic Education: Study of Early Hong Kong Journalism Education (1927–1949)

Shufeng LIU

Abstract

The Hong Kong Journalism Agency,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27, was the first journalism educational agency in Hong Kong. This was followed by Life Journalism College, the China Amateur School journalism course, China Journalism College, the Dade College journalism course, and the Min Zhi Journalism School Hong Kong branch. They all placed great emphasis on practice and offered short-term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education led by many well-known journalists and professors. Both the Hong Kong Journalism Agency and Life Journalism College faced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soon after their establishment. All forms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were forced to shut down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Hong Kong flourished again due to the initiativ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other leftist intellectuals after World War Two, up until Dade College was closed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for “preaching politics.”

Keywords: Hong Kong early press, journalism educati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patriotic education

Shufeng LIU (Associate Professor). Editorship, *The Yearbook of Chinese Radio & TV*. Research interests: Communication history, Radio and TV, communication history of Hong Kong and Macau.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Liu, S. (2017). From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o patriotic education: Study of early Hong Kong journalism education (1927–1949). *Communication & Society*, 39, 189–219.

致謝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15年度重大項目(第二批)「百年中國新聞史史料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15ZDB140)階段性成果。

引言

鴉片戰爭之後，香港被清政府割讓給英國。在英國人的統治下，香港大部分時間是一個「無民主、有自由」的經濟中心，成為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橋頭堡。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內地軍閥混戰，而「大英帝國於1932年簽訂了《渥太華協議》(Ottawa agreement, 1932)，作為受英國殖民統治的地方，香港的工業產品得以享有大英帝國特惠稅(imperial preference)的權利。」(王賡武，1997：374)香港工商業的繁榮發展產生了大量的投資就業機會，因此於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吸引了大批的內地尤其是廣東移民。全面抗戰爆發後，來自全國各地的難民爭相逃港，僅1937年就有約10萬難民湧入香港。雖然淪陷後香港人口大量減少，但抗日戰爭勝利後，由於國共內戰，又有大批內地人士再次湧入香港。

人口的流動帶來的是對資訊的需求。從新聞傳播事業的角度看，香港是中國近代報刊的發祥地，如《香港船頭貨價紙》、《孖刺西報》、《華字日報》等，它們分別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中文商業報紙、第一份英文商業日報和第一份中國人自辦的中文日報。香港的報刊無論體例還是內容，都成為中國現代報刊模仿的榜樣。如上海《申報》創刊時即在〈發刊詞〉中提到：「新聞紙之制，創自西人，傳於中土。向見香港唐字新聞體例甚善，今仿其意，設申報於上洋。」二戰前香港的報業市場十分發達，經歷過「精英報業」時期、「黨派報業」時期之後，進入較為商業化的「社經報業」時期(李少南，1997：497-521)。當時的報業市場上既有宗教報刊，也有商業報刊；既有政黨報刊，也有黃色小報。據日人統計，到1941年香港淪陷前，全香港共有39份中文報紙，7份英文報紙，共46份(轉引自李谷城，2000：173)。抗戰勝利後至1949年，香港不是國共重視的焦點，雖兩方在港各有言論陣地，但香港的新聞事業在港督的治理下逐步平穩恢復。

鑒於香港新聞傳媒的獨特地位和作用，對香港新聞教育進行研究和介紹文章或篇章不少，其中以俞旭、朱立、朵志群1998年的文章〈香港四所院校新聞教育之比較〉影響最大。該文作者為浸潤新聞傳播教育多年的著名教授，對香港新聞教育有參與、建構之功，是較早對香港

新聞教育進行研究和反思的文章，後人之研究多引其史實、觀點（如李家園《香港的新聞教育》）。然而，對香港新聞教育的發展歷程，尤其是香港早期新聞教育的研究，並未受到兩岸三地乃至世界新聞傳播學界的重視，極少有學者關注香港早期新聞教育的發展，現存資料多為對相關人物或院校的個別回憶或介紹，較少綜合整理和分析。本文圍繞香港新聞學社、生活新聞學院、香港中華業餘學校、香港中國新聞學院、達德學院、民治新聞專科香港分校等個案收集資料，並對重點組織者（如黃天石、金仲華）、主要教師（如劉思慕、陸詒）等的回憶錄或有關介紹文章進行重點比對，結合有關學生（如香港中華業餘學校的金城、何賜樂，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的鍾華、麥勁松、楊文炎、唐葆華、葉有秋，達德學院吳秉文、藍威、李翼華、鄭海鷗、張明生、吳平、陳燕芳等）的回憶文章，試圖大體還原香港早期新聞教育的形態。其中，對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和達德學院的記載相對較多。有關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的，有鍾華的文章〈香港中國新聞學院〉，以及四本內部出版物《歷史·話舊·懷念——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紀念文集》、《今昔依依——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校友通訊集》、《情繫中新——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創建55周年紀念文集》、《風雨歷程——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創建59周年紀念文集》，收錄了上百篇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師生的回憶文章、題詞、詩歌等。有關達德學院的，影響較大的先有盧瑋鑾（小思）的文章〈達德學院的歷史及其影響〉，後有劉智鵬的專著《香港達德學院——中共知識份子的追求與命運》（2011），後者對香港達德學院新聞專修科的資料收集較為詳細，另外也有正式出版的四本紀念文集《達德學院的教育實踐》、《達德學院建校五十周年紀念文集》、《達德歲月：香港達德學院紀念集》、《文化青山：香港達德學院概況》，記載了課程設置、回憶文章和有關照片等。更早的香港新聞學社、生活新聞學院、香港中華業餘學校，以及開辦時間較短的民治新聞專科香港分校資料則較為缺少。如有關香港新聞學社和生活新聞學院的資料，只能從後人對主要創辦人黃天石的介紹和回憶文章中找尋線索。有關香港中華業餘學校新聞科的主要資料，來自周佳榮、丁潔主編《陶行知與香港「中業」教育》中的各篇回憶文章與陶行知年譜進行比對。民治新聞專科香港分校的資料最少，學校創辦人顧執中雖對學校的創辦進行了描述，但實

際負責人陸詒的回憶則僅有隻言片語，幸有當時刊登學校招生廣告的《華商報》為佐證。

總體而言，為了保存文獻，研究香港早期新聞教育的發展歷史，考述有關群體的新聞教育活動，本文從有關人士的回憶、當時有關報紙刊登的報導、當時的招生廣告、有關人士的年譜長編、相關檔案資料中搜集史料，探討香港早期新聞教育的形態，以及具有怎樣的特點。並結合當時香港社會發展狀況、新聞界及從事新聞教育人士的處境與心態，分析香港早期新聞教育何以出現這種形態及特點。以期為學界研究香港早期新聞傳播史提供參考。

香港最早的新聞「夜校」

香港報業雖然發達，但由於工作辛苦、收入有限，新聞從業者的地位始終不高，有錢的人家大都希望孩子去做醫生、律師等職業，只有較底層的家庭才會讓孩子去報社工作。而當時報社用人一般也是先從校對做起，優秀的成為見習記者、助理編輯，再逐漸成熟。實際上，當時的報業遠未達到成熟的境界，記者被稱為「訪員」，各報稿件大多採用自各通訊社。由於大多數人在進入報社前從未接受過專業培訓，能否成長進步完全靠個人資質，因此報社十分需要專業的新聞教育機構。但從另一個角度講，願意從事報業並從底層做起的年輕人大多家境貧寒，無法支付高額的學費。在這種情況下，半工半讀性質的「夜校」應運而生。

香港新聞學社

香港第一家新聞教育機構是由小說家黃天石(筆名傑克)於1927年創辦的「香港新聞學社」，該校於夜間上課，1931年停辦。

1927年秋，黃天石聯合《工商日報》的關楚璞、《迴圈日報》的何雅選、《華字日報》的勞緯孟、《香江晚報》的鄭天健、英國路透社香港分社社長黃憲昭等人，共同發起成立香港新聞學社，黃天石任社長，關楚璞和何雅選為副社長，黃憲昭為教務長(後由鄭水心接替)。設置課

程包括：中國新聞史、歐美新聞史、新聞學理、新聞學概論、報業管理、出版法、採訪術、編輯學、社論寫作、政治邏輯、中國現代史、中國文學史、文學概論等(楊國雄，2010：57)。除上述發起人之外，授課的教師還有新聞界資深人士如梁謙武、莫冰子、古愛公、譚荔琬、龍寶秀、鄧稚援等(鄧善熙，2009：35)。

作為一所夜校，該校於晚上7時至9時上課，每週六次，學費15元，學員分甲乙兩種，前者為正在從事新聞工作的半工半讀者，後者為尚未從事新聞工作但有志於此的青年，第一期收學員30人。除此之外還設兩年制的函授部，函授生超過百人。

除了上課之外，學校還設立了「南中國電訊社」供學生實習，這個電訊社設有電機，是香港第一家通訊社，通訊網達日本東京、美國紐約、英國倫敦等各大城市。「南中國電訊社」分中文部、英文部、日文部，分別由關楚璞、黃憲昭以及東京《日日新聞》駐港特派員日本人德富主持。在德富的幫助下，學生在通訊社的實習成果要為日本各大通訊社供稿。

作為香港第一所新聞教育機構，香港新聞學社有較為雄厚的師資、比較先進的實習設備和較好的實習機會，也確實培養出了符合當時需求的新聞人才。畢業的學生中，有《蝦球傳》的作者黃谷柳、報人麥思源、《星島晚報》總編輯唐碧川、《經濟商報》總經理葉飛絮、《華僑日報》文化版主編黃喬名等。

由於首創者黃天石一直對日本文化懷有熱情，1926年曾在雲南軍閥唐繼堯的推薦下赴東京學習，但因語言不通加之身體不適倉促返港。然而黃天石一直不忘其志，跟隨在日本出生的畫家鮑少游研習日文並小有所成，終於1929年再度赴日。學校交由關楚璞打理，3個月後該校因財政困難，結束停辦。

生活新聞學院

1937年，曾參與香港第一所新聞教育機構香港新聞學社創辦的香港《工商日報》副社長關楚璞，與《迴圈晚報》總編輯黃育根、小說家、電影導演侯曜、專欄作家黎伯挺等，共同創辦了香港第二家新聞教育

機構「生活新聞學院」。¹這所學院的辦學模式與香港新聞學社類似，同樣是在夜間上課，由報界從業人員授課。為了給學生創造實習的機會，學院開辦了「楊秋通訊社」供學生實習，向香港各大報社供稿。學生還可進入《循環日報》參與校對、寫稿、編輯等工作。除此之外，該校還經常邀請名人進行演講，為學生開拓視野。後來，「生活新聞學院」改名為「香港文化事業社」，出版《廿世紀週刊》，並承辦《迴圈日報》的副刊《香港文藝》和《兒童週刊》。

生活新聞學院學費5元，開辦時學生僅30餘人，3個月後只剩下15人，半年後只剩下7人。由於學員不多，收入不足以支撐辦學，連房租、雜費也難以支付，創辦人空有一番熱情卻無力回天。1937年冬，關楚璞應《星洲日報》社長胡昌耀之邀由香港赴新加坡擔任《星洲日報》主筆。侯曜也專心於電影事業。香港第二家新聞教育機構也關門結業。

香港中華業餘學校新聞科

陶行知先生一生多次海外遊歷，1938年9月1日在參加香港文化界為歡迎他歸國舉行的座談會上，發表了被稱為「回國三願」的演講，一是創立曉莊研究院培養高級人才；二是開辦難童學校收容流離失所的兒童；三是在港舉辦業餘補習學校。而這「三願」中最早實現的是第三願：成立了中華業餘學校。當時，陶行知的許多時間和精力放在向全世界及中國各地傳播其教育思想理念上，陶行知自己並未參與該校的具體籌辦及運作，但這是他生活教育理論的一次重要實踐，也使得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香港更加廣泛地傳播開來。

中華業餘學校於1938年11月開學，該校董事長為陶行知，校長吳涵真，教導主任方與嚴。因時局動盪，陶行知、吳涵真、方與嚴等人相繼離港，無人主持校務，結果中華業餘學校開辦了兩期，不到一年的時間，就於1939年夏停辦。二戰後香港教育需求增加，1948年8月10日以中業學院的名稱復辦，以郭沫若為董事長、朱智賢為院長，後增聘黃繩為教務主任；次年成慶生接任院長、麥堅彌為教務主任。

中華業餘學校的具體領導工作是教導主任方與嚴抓的(蔡自新，1994：49)。學生來自工廠、商店、銀行、海關(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

教育理論研究室《陶行知年譜稿》編寫組，1982：82）。開設的課程有時事分析、政治經濟學、新聞、文學、英文、日文、教育、戲劇、繪畫等；每科授課共24小時，學生可以自由選科（周佳榮、丁潔，2010：9-10），每晚上課。該校按學生程度分為甲乙丙三組，學生自由選課，另設講座，邀請在港專家進行專題講座。學費每期港幣5元。根據學校成人性、業餘性、在職性的特點，規定每3個月為一個學期；每學科教學時間，要求不少於24課時。1948年復校的中業學院設英文、會計、教育、新聞、文學組。每星期一至六晚七時至九時授課（徐潤儉，2010：51）。

中華業餘學校貫徹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的思想，實行「學做結合」，各科學員在科任老師的指導下，組織了各種教學做活動小組（方駿、熊賢君，2008：221）。新聞科的教學也十分重視實踐。據學生金城回憶，學校為了配合新聞、文學系的教學，專門拿出一些錢，辦了《中業》雜誌。那時經費困難，無法購買印刷設備，就通過關係在香港《星島日報》館印刷廠代印。學校在上新聞、文學課時，讓同學們來《中業》訓練、實踐，學習瞭解編輯、組稿、鉛字排版、清樣校對、印刷、採訪等方面的工作（金城，2002：662）。

中華業餘學校有一支非常優秀的教師隊伍，多是知名人士，據學生何賜樂、喬青回憶，當時教授新聞的老師有郭步陶、薩空了、惲逸群等，茅盾、樓適夷、林煥平等教文學課，金仲華、喬冠華、劉思慕、鄭森禹等擔任國際時事、政治經濟等課程（何賜樂，2010：28；喬青，2010：31-32）。1948年復課的中業學院同樣有許多名師，如新聞群組授課老師有《大公報》戰地記者孟秋江等（徐潤儉，2010：51）。

小結

縱觀香港最先開辦的兩家專門新聞學院以及香港中華業餘學校新聞科，其辦學模式基本相同，辦學理念相似，均是新聞職業教育性質。從辦學目標看，這時的新聞教育均是以培養新聞實用人才為目標，為的是滿足當時香港報業發展的需要，解決學員個人的就業問題；從主辦者和教員看，最早的兩所新聞學院基本上都是香港資歷較深的報界人士，

而香港中華業餘學校是一所綜合類業餘職業教育學校，新聞科是由越來越多的來港避難的中共及左翼知識份子和報人參與授課；從課程設置看，除了一般性的授課之外，主辦者都特別重視實踐，憑藉教師自身在新聞界的影響力為學員提供實踐的機會，而兩所專門的新聞學院更是均辦有通訊社；從最後的結局看，由於學員不足，加之主創者本身流動性較強，最終這幾所「夜校」均因主辦者離港、學費入不敷出而結業。總體而言，雖然這幾所「夜校」開辦時間均不長，但為香港新聞業培養了許多人才，開香港新聞教育的先河，而香港中華業餘學校新聞科更成為中共及左翼人士在香港新聞教育的先聲。

中共及左翼人士在香港的新聞教育

二戰中，由於日本侵華危害了包括英國在內各國的在華利益，港英政府對待中共及各抗日愛國力量並未完全扼殺。但為了不得罪日本，港英政府也限制各種抗日力量的發展，1938年9月，港府通過了一項《緊急條例》，宣佈香港對中日的糾紛保持中立態度(葉德偉，1982：28)。在新聞傳媒方面，安排有專門的機構人員對報刊進行審查，規定凡「抗日」「敵人」「漢奸」等字樣一律不許見諸報刊，只能刪改為「××」或以方塊代替。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達成協議共同抗日，紅軍主力部隊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並在全國多處設立八路軍辦事機構。廖承志赴香港於1937年12月成立了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對外稱粵華公司)，負責中共在香港的聯絡與宣傳。1941年8月，中共辦起了《華商報》，並與其他南下來港的愛國知識份子保持密切聯繫，鼓勵、支援他們辦報辦刊，這一時期，鄒韜奮主編的《大眾生活》，「茅盾主編的《筆談》、《文藝陣地》，郁風主編的《耕耘》，張明養主編的《世界知識》，張鐵生主編的《青年知識》，馬國亮主編的《大地畫報》等，都相繼出版。」(夏衍，1987：3)此外還有宋慶齡、何香凝兩位夫人各自推動主辦的《保衛中國同盟通訊》、《僑胞》等。這一系列左派報刊的出版，改變了香港商業報紙一統天下的局面。

除此之外，商業報紙也因左翼知識份子的加入而一度改變面貌，

如金仲華擔任總編輯期間的《星島日報》，以及楊剛、羊棗擔任記者時的香港《大公報》等等，通過創辦進步專刊、發表軍事及國際評論、刊登抗日愛國言論等，成為南下香港的左翼知識份子發表演論的園地。事實上，這種以商業報紙面貌出現的報刊因資金更為雄厚、發行量大，得以有實力衝擊當時香港原有的華字、工商、華僑、循環等四大主流報紙。也正是金仲華、楊剛、羊棗等，通過《星島日報》、《大公報》等的影響力，得以假中國青年記者學會香港分會的名義，創辦了中共及左翼人士在香港最早的新聞教育機構——香港中國新聞學院，²為中共及左翼愛國人士的新聞教育打開一片天空。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恢復。後來中共及左翼人士又開辦了達德學院，其中也開設了新聞學系。上海創辦的民治新聞專科也赴港開辦分校。達德學院和民治新專香港分校的開辦時間不長，在冷戰的背景下，港英當局關閉達德學院，民治新專香港分校也自動結業，香港的新聞教育於1949年告一段落。

香港中國新聞學院

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於1939年4月23日舉行開學典禮，到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前夕辦了三屆。抗戰勝利後，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於1946年5月復辦，又開辦兩屆，另於1946年9月和1948年10月開辦了兩次函授課程，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結束。

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是由中國青年記者學會香港分會主辦的。中國青年記者學會(簡稱「青記」)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成立的新聞界組織，該會於1937年在上海籌備，1938年3月30日在湖北武漢正式成立。「青記」創辦初期會員較少，僅數十人，後來發展到一千多人，分會遍及全國各地。1938年10月30日，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香港分會成立，金仲華為分會會長。香港「青記」與總會及其他分會一樣，主要活動包括創辦刊物、成立圖書館、組織各種活動等。金仲華擔任《星島日報》總編輯之後，即創《青年記者》專版，以青記香港分會的名義主編，並聯絡香港各方面知名人士成立的香港中國新聞學院。1941年5

月，中國青年記者學會香港分會召開臨時理事會，認為因戰時交通不便，香港與內地聯繫不易，故與總會脫離組織隸屬關係，改名為「香港青年記者學會」，並於6月向香港華民政務司備案(《華商報》，1941年6月23日)。雖然名義上脫離了組織隸屬關係，但實際上改名後的香港青年記者學會其性質及與內地有關人士的來往並未有任何變化。如當年「九一記者節」時，香港青年記者學會組織紀念大會，主席團成員為范長江、葉啟芳、惲逸群、喬冠華、林煥平，均是原中國青年記者學會的重要人物(《華商報》，1941年9月2日)。

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成立時，邀請曾任日本大使、時任全國賑務委員會委員會副主任的許世英為董事長，邀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擔任副董事長，以香港《申報》總編輯、老報人郭步陶為院長，《星島日報》總編輯金仲華為副院長，教務主任為《珠江報》編輯譚思文，實際操辦者為金仲華，前三屆始終未變。辦學宗旨是：養成健全之新聞工作人員適應戰時新聞事業上之需要。戰後第四屆、第五屆及函授課程開辦時，許多在戰時撤離香港的教授未回港，第四屆院長為剛剛離開《新生日報》的葉啟芳、教務主任梁若塵，第五屆院長為時任《華商報》總編輯劉思慕，教務主任《華商報》編輯高天。1946年開辦的函授班及1948年開辦的函授學院院長劉思慕，函授班主任楊奇，函授學院教務主任高天。辦學宗旨改為：造就實際的新聞專業人才。

為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授過課的教師，前三屆有郭步陶、金仲華、羊棗、許君遠、樓適夷、梁式文、劉思慕、羅吟圃、吳范寰、梁若塵、喬冠華、鄭森禹、王紀元、邵宗漢、葉啟芳、潘朗、張問強、惲逸群、盧豫冬等，後兩屆有薩空了、葉啟芳、梁若塵、高天、劉思慕、梁若虛、王家振、千家駒、俞鯉庭(筆名沙溪)、廖沫沙(筆名懷湘)、沈志遠、黃藥眠、赫生、韓北屏、陳文川、趙元浩、劉思慕、陸詒、鄧楚白(鄧家愷)等。並經常邀請在港名人講座。

香港淪陷前環境複雜，如國民黨在香港的黨報《國民日報》始終敵視中共及其他黨派所辦的報刊，認為「青記」香港分會「最初完全在左翼分子控制之下，但《國民日報》號召其他擁護政府的報人，也一同加入，從他們手裡奪回部分的控制權。那些非共黨人也進入新聞學院任

教……教授方面，非共的有王啟煦(國民日報總編輯)，唐碧川(當日的香港新聞社社長)，譚思文等」(林友蘭，1977：61)。但實際上，這幾位也與中共及左翼人士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如王啟煦雖為陳佈雷妻弟，但也是「青記」最早的發起人之一。

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的課程設置因各屆教師不同而略有差異，主要有新聞編輯、新聞文藝、經濟新聞、國際新聞、本國新聞事業、現代政治、報館經營、新聞採訪、軍事新聞、資料整理、現代史、評論研究、新聞學概論、新聞史、社論研究、印刷常識、廣告學、國內新聞、新聞文學、譯電研究、近代國際問題研究等。

隨著日本侵華腳步的加快，越來越多的失學青年從內地逃往香港，再加上原有的香港學生，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招生較之前的新聞「夜校」火爆。前三屆招生分別達78人、73人和58人，復辦後兩屆分別招生57人和48人，函授班招生30人，函授學院招生100人(鍾華，1991：146)。中國新聞學院的入學資格規定一直是高中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但需經過測驗。授課時間均為除週六、周日的每天下午7時起，前三屆兩個小時，後兩屆兩個半小時。

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第一屆1939年4月24日開課，實際授課時間5個月；第二屆1940年3月11日開課，學制4個月；第三屆1941年2月1日開課，學制5個月；第四屆1946年5月13日開課，學制3個月；第五屆1946年9月14日開課，學制半年。

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在課程設置上特別重視實踐。除了晚上上課之外，白天分組到《星島日報》、《大公報》、《珠江日報》、《華商報》等報館去實習，校對、採訪、編輯、寫作、資料等方面均有涉獵。除此之外，還安排每個學習小組每週出版一份油印報，這樣無論採訪、寫作、編輯、校對、排版、印刷等各方面均能得到鍛煉。第一屆學員畢業後，學院由梁若塵、葉廣良等創辦了中國新聞通訊社，學員畢業後可以參與其中。雖然中新社初創時期條件十分簡陋，學員們經驗不多，寫出的稿件也差強人意，但由於有其他學員畢業後赴內地工作，尤其在第一屆學員中選派了八名畢業生組成粵北戰地記者組，赴廣東隨十二集團軍採訪，可以比香港其他的通訊社獲得更多國內新聞，且

抗戰旗幟鮮明，中新社遂逐漸站穩腳跟，堅持到香港淪陷前才告結束。

達德學院新聞專修科

達德學院是中共和左翼民主人士合作開辦的高等院校(劉智鵬，2011：12)。抗日戰爭結束後，香港重新由英國管治，港英政府繼續維持戰前的自由貿易政策。戰後的香港政治環境相對比較寬鬆，政府主要精力放在恢復社會秩序及發展經濟上。國共內戰開始之後，中共說明部分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及知識份子從內地轉移到香港，這些人成為達德學院的主力。

1946年10月10日，達德學院成立，陳其瑗任院長，陳此生任教務主任，楊伯愷任總務主任。設商業經濟系、法政系、國文系，1947年秋增設新聞專修班，1948年下學期新聞專修班第二次招生。1949年2月，港英當局突然下令關閉達德學院。

達德學院新聞專修班有三位專職教授，陸詒、梁若塵、張兆麟(劉樂揚)。新聞專修班學制一年兩個學期，實行學分制，共58學分，課程包括新聞學概論、新聞寫作、報業史、報業管理、速記學、社論寫作、廣告及發行、編輯術及實習、探訪術及實習、攝影術及實習、電報技術、英文、中國近代史、世界近代史、中國地理、世界地理、倫理學、實用經濟學及經濟問題、法學通論、社會問題、心理學、時事研究、各國政府及政黨等。從課程設置上看，專業課程中既有新聞理論類，也有新聞業務類，還有速記、電報等技術類；基礎課程中則有中外史地、經濟社會、法學心理；同時特別重視英文和時事研究，兩個學期均有設置；除此之外，第二學期課程更注重實用性，尤其還增加了實習類課程，學以致用。

達德學院新聞專修班也十分重視交流與實踐。據《達德歲月：香港達德學院紀念集》「大事記」記載，1947年12月，新聞專修班同學與「民治新聞專科學校」同學交流，1948年下半年至年底，三次前往《文匯報》、《星島日報》、《華商報》實習參觀，並由陸詒帶新聞專修班同學前往「國貨展覽場」採訪。12月20日，香港《大公報》六位編輯來學院與

新聞專修班同學座談。除此之外，新聞專修班同學在教師指導下辦一份校內報刊《達德新聞》。

民治新聞專科香港分校

民治新聞專科是中國歷史最為悠久的新聞教育學校。學校創辦人為顧執中，曾在該校任教的有戈公振、翦伯贊、艾思奇、陳翰伯、鄭振鐸、陸詒、彭樂善等，為中國的新聞傳播事業培養了許多人才。民治新聞專科學校誕生於1928年，歷經民國、抗日戰爭、國共內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辦學地點從上海到重慶，還一度在香港、緬甸仰光和印度加爾各答辦學，最終於1954年停止招生。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幾位老友友於1983年恢復民治新聞學校，顧執中也於1985年10月在北京復校，1998年宣告結束。

有關民治新聞專科在香港辦學的資料不多，據1948年3月12日刊載在《華商報》的招生廣告看，民治新聞專科每期招生20人，要求高中程度有志於新聞工作的男女青年，上課時間為每晚七時至九時。據創始人顧執中回憶，1940年被國民黨特務槍擊受傷後曾逃往香港，雖然當時香港生活比內地舒服，他曾一度想把民治新專遷港復課，但多次考慮覺得不妥而未成行。國共內戰開始後，民治新專的學生積極參加反獨裁、反內戰、反饑餓等示威活動，擔心在上海被封，決定到香港設立分校。為募捐出力最多的是校董董德乾，一共一萬幾千元的港幣大多數是他募捐而來。1947年秋天，顧執中與陸詒、耿堅一起搭船前往香港，在分校的籌備工作稍有眉目後，顧執中、耿堅先後離開香港返回上海，民治新聞專科香港分校由陸詒單獨負責。民治新專香港分校辦到1949年春天結束，實際每期約收學生三十人左右(顧執中，1981：205-206)。

而據民治新聞專科香港分校的負責人陸詒回憶，他在香港灣的菲林明道租到一個四樓的樓面，辦了民治新專香港分校。招收的學生都是職業青年，在晚上上課，學生人數少而且流動性大，辦到1948年底即結束(陸詒，1983：141)。

陸詒一直與中共關係密切，國民黨曾於抗戰期間對陸詒進行調查，認為陸詒對國民黨的抗戰建國政策，一向「持反對態度，其平時講課，每每均以批評為博得青年擁護之工具。而於蘇聯一切政策，無不心悅誠服，滿口讚揚，是故該員思想左傾之問題，已屬毫無疑問。同時，該員所請蒞校演講之人物與講題，類多左傾份子及以攻擊政府為職旨之材料……以此等人物主持該校，誠為危險也。」(《中國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五輯 第二編》，1997：837)

此次陸詒去香港，也是在周恩來的指示和幫助下完成的。據陸詒回憶，1947年10月17日上午，他應范長江之邀赴馬思南路中共代表團辦事處談話，得知周恩來要他即日離開上海到山東解放區工作。第二天得知國民黨政府軍隊正在進攻煙台，遂令其改往香港找章漢夫安排工作。臨行前，周恩來約陸詒談話，說「你在上海新聞界目標較大，不宜久留，還是早點到香港去為好。」(陸詒，1994：36-37)

陸詒既是民治新專香港分校校長，也是達德學院新聞專修科專職教授，在他的安排下，兩所學校新聞科的同學得以相互交流。據達德學院學生吳秉文回憶，「有一天，民治的同學來達德參觀，互相學習。為了迎接民治的同學，新聞班課室裡貼了標語、對聯等，十分隆重。我只記得對聯的下聯是這樣的：『要達德、要民治、還要團結』。此後我們一些同學也去過民治。」(吳秉文，1996：359)

小結

縱觀以上三所新聞教育機構，香港中國新聞學院、達德學院、民治新專三者有著直接而密切的聯繫。首先，這三所學校的創辦都與中共及左翼人士關繫密切，尤其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是在「青記」的直接領導下創辦的，與中國內地各「青記」分會持一樣的觀點和行動。其次，三所學校的教師志趣相投、關係密切，如金仲華、喬冠華、張鐵生等都是當時國際時事的著名評論家，常在一起聚會聊天。而當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的教師在達德學院開辦後，原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的教師更是全部轉入其中。如陸詒和梁若塵既是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第五屆和第一屆的教授，也是達德學院新聞專修班的負責人和專職教授，陸詒

還是民治新專香港分校的創辦人 and 負責人；曾任第五屆香港中國新聞學院院長的葉啟芳在達德學院講英文，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教授千家駒、劉思慕等成為達德學院商經系教授，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教授高天成為達德學院法政系教授，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教授黃藥眠是達德學院文哲系主任。除此之外，曾經在達德學院進行過政治類專題講座的還有曾為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教師的薩空了（講《關於國際關係》）、喬冠華（講《國際國內形勢》、《人民戰爭的形勢》、《渡江前夕的形勢》、《偉大的戰略決戰》、《將革命進行到底》）等。

香港早期新聞教育的特點

中國20年代至40年代的新聞教育，眾多密蘇里大學的中外校友來華參與創建新聞教育（羅文輝，1989：201-205），一般認為最先受到美國新聞教育的影響比較大，後來則逐漸由照搬密蘇里模式到形成自身特色（林牧茵，2013：273）。而以復旦大學新聞系的創立和發展為標誌，中國新聞教育逐步摸索出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以培養應用性人才為目的，以新聞知識與技能的教育訓練為教學重點（李建新，2003：164-165）。

具體到香港早期新聞教育，既不受港英官方的關注和影響，也並無內地那般受到美國新聞教育的巨大影響並依託知名高校開辦學歷教育，又有別於香港本地其他行業個體作坊式的口傳心授，而是依託香港本地及來港的具有豐富經驗的報人，結合動盪時期生活在殖民地的香港青年的生活實際，從解決生計入手，逐漸發展到施加思想政治影響，從而呈現出獨有的特色。總體而言，可以總結為教師方面名人薈萃，課程方面注重實踐，學生方面熱情漸高，課程方面從職業教育轉向愛國報國教育，開辦和結業則與主辦者所擁有的資源息息相關。

教師：名人薈萃

縱觀幾所新聞學院，無論首創者還是教員，大都是在新聞界較為資深者，許多還擔任總編輯、主筆、經理等重要角色。如香港新聞學

社創辦人黃天石，年少成名、風流倜儻(黃苗子，2001)，還曾任唐繼堯的幕僚，是當時香港報界的一時之選，他的小說風行一時，有「南黃北張」之稱(張即張恨水)。黃天石還創辦了香港基榮出版社，專門出版自己的小說以防盜版。再如香港中國新聞學院，集中了一大批南下的優秀知識份子和報人。香港淪陷前的首任院長郭步陶德高望重，當時為香港《申報》總編輯，還曾任復旦大學新聞系和申報新聞函授學校教授；主持工作的副院長金仲華當時為香港《星島日報》總編輯，同時協助好友鄒韜奮辦報，還堅持《世界知識》在香港的出版，並參加了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擔任執委會委員。戰後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復辦，主辦者也多為在各報主事者，如葉啟芳、劉思慕、楊奇等。達德學院創辦時，正值國共內戰，大批民主人士、文化人士在中共的幫助下疏散到香港乃至東南亞一帶。遷到香港的「中共的幹部各有政治任務，在香港不愁出路；文化人則遠離他們的活動地區，無法在原來的崗位上發揮他們的專長。這時候的香港正在努力恢復戰前的活力，暫時並無足夠的文教機構可以讓這批文化人棲身。他們學有所成，是文教界一支高質素的團隊，一所高等校院無疑就是安置他們的理想地方。」(劉智鵬，2011：6)以這種觀點看，正是先有了這批無處安置的高素質人才作為基礎，才成立了達德學院這所學校。如達德學院新聞專修科的主任陸詒，就是當時國際新聞社香港分社主任、《光明報》的主編，也是民治新聞專科香港分校的校長。

從師資來源看，這些名師大部分都是自內地來港的文化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香港人口的流動性非常大。在來來回回幾次的遷徙中，有大批知識份子和報人往來於香港，這成為香港新聞教育得天獨厚的優勢。

教學：重視實踐

「由於受英國『文雅教育』思想的影響，港府辦理的職業學校很少。……而香港作為一個商業社會，需要大量受過良好職業訓練的初級技術人才，這項任務就歷史性地落到了私立培訓機構和企業身上。」(方駿、熊賢君，2008：220)由於「這一時期，香港培訓新聞記者和傳

媒從業員一直奉行的是學徒制(apprenticeship)，新聞教育多是提供短期職業培訓課程。」(俞旭、朱立、朵志群，1998：23)因此，無論是香港新聞學社、生活新聞學院，還是中共及左翼人士在港開設的新聞教育，都是職業教育性質的，以培養實用的新聞人才為目標。

作為職業教育機構，目標是培養能夠動手的實用人才。從第一所新聞培訓機構香港新聞學社開始，學院的主辦者就積極為學員提供動手的機會。如香港新聞學社的「南中國電訊社」購買了無線電機，是當時的「高科技產品」，還請東京日日新聞駐港特派員日本人德富幫助，將學生在通訊社的實習成果為日本各大通訊社供稿。生活新聞學院則承辦了《迴圈日報》的副刊《香港文藝》和《兒童週刊》，相當於學員直接參與當時香港最著名報紙的各項工作。中共及左翼人士主辦或參與的三所新聞教育機構，則均開辦內部刊物，由學員自己完成辦報辦刊的全部流程。如達德學院新聞專修科主任陸詒回憶說，「說特點，只有一個特點，那就是理論聯繫實際。我們著重在新聞工作的實踐中鍛煉，以實踐為準則。我們自籌經費，先辦了一張油印報《達德新聞》，從1948年下半年開始改為鉛印的小報，我們把全班同學分別安排在編輯、採訪、評論和管理(包括經理、印刷、發行、廣告)等各部門，並且定期輪換工作。」(陸詒，1996：248)

在時局動盪、烽火連天的年代，學得一技之長，退可安身立命，進可報效祖國，重視實踐成為當時新聞教育的唯一追求。也正因為如此，這些新聞教育機構十分重視學員的就業和出路問題，無論是「南中國電訊社」「楊秋通訊社」，還是「中國新聞通訊社」「粵北戰地記者組」，某種程度上都是為學員畢業後尋找出路提供線索和幫助。這些新聞教育機構也確實為當時香港及內地包括東南亞培養了一批優秀的新聞人才。

學生：熱情漸高

香港最早的兩間新聞「夜校」創辦時，雖然中國內地時局動盪，但香港總體而言還算穩定。如前所述，當時香港報人的社會地位和收入並不算高，但由於其他更好的職業門檻更高，因此願意投身報業的以中下層百姓為主，如香港新聞學社的學員黃谷柳出生於越南的農家

庭，學員唐碧川年少時也僅靠在港工作父親的微薄薪水糊口(唐錫良、鄭壽稠，1992：12-13)。這種情況就造成學員的來源並不穩定，學員一方面半工半讀十分辛苦，而且對自己在報業的前途也並不明朗，僅作為謀生的手段而言，參加新聞職業培訓的興趣也就不大了。而且由於所收學費不高，教師僅拿象徵性的收入，教師和學生的流動性均比較強。

然而時移世易，隨著日本侵華腳步加快，懷著救國之心參與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的學員越來越多，前三屆招生分別達78人、73人和58人，與之前香港新聞學社、生活新聞學院慘澹經營收場形成鮮明對比。加之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的師資力量雄厚，這也吸引了許多出身中產階級乃至更加富裕家庭的學員參加，如第一屆學員杜啟芝、第二屆學員黎士英等(麥勁松，1991：131；楊文炎，1994：125)。戰後的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復辦後，兩屆分別招生57人和48人，函授班招生30人，函授學院招生100人。而達德學院更是以強大的師資，吸引了大批華僑學生、內地學生、港九本地學生(香港達德學院北京校友會，1992：11)。據1996年出版的《校友通訊錄》統計，有姓名住址的學生為593人，失去聯繫的88人，已經辭世的121人，以上總共802人，其中新聞班至少有58人(《達德歲月》編委會，2004：94)。

從近現代歷史上看，香港一直是一個避難的地方，每當中國政局不穩的時候，便會有許多國內的同胞湧入香港。香港的新聞教育從慘澹經營到熱火朝天，也是與中國內地形勢的發展直接相關的。從香港人口數的角度看，1901年新界納入香港版圖時，香港人口數為283,975，隨著日本侵略中國的步伐，越來越多的人們湧入香港，1937年香港人口數為1,006,982。這一數字到1941年香港淪陷前達到頂峰，為1,630,000(丁新豹，2005：41)。香港淪陷後，日本人將大批中國人遣返，只剩60萬左右。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內戰又起，香港再度成為「避風港」。這次由國內遷至香港的難民更多，其中許多青年因戰爭而耽誤了學業，希望能在香港重新投入校園生活，但當時香港只有一所大學，吸納能力有限，他們只能尋找這種業餘性質的學校；還有一些知識青年來到香港後無事可做、報國無門，進入當時香港唯一培養新聞人才的中國新聞學院，就已經並不僅限於個人前途考慮，更有知

識青年愛國救國報國之心在其中。中國的知識份子一向以天下為己任，而當時中國內地報業的經驗已經證明報紙與政治時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雖然當時香港的新聞業紛亂複雜，各種政黨、利益關係雜處，但知識青年憑著一腔奮發報國的熱情，香港的新聞教育也愈發蒸蒸日上。

課程：從職業教育到愛國報國教育

單純從課程設置上看，香港新聞學社、生活新聞學院與中共及左翼人士開辦的新聞教育比較類似，主要課程基本包括三類，一是新聞理論及歷史課，如中國新聞史、歐美新聞史、新聞學理、新聞學概論等，二是新聞業務課，如報業管理、出版法、採訪術、編輯學、社論寫作等，三是其他文史基礎課，如政治邏輯、中國現代史、中國文學史、文學概論等。唯一不同的是後者比前者多設置了有關時事政治的課程，如現代政治、近代國際問題研究等。面臨國破家亡、國際形勢日益複雜的局面，面向社會大眾的新聞教育中增加類似課程也並不令人意外。然而，相似的課程設置不代表相似的培養結果，黃天石、關楚璞等人所辦的新聞教育機構是為了培養瞭解報業運作、能夠迅速參加新聞工作的熟手，而香港中國新聞學院以及達德學院，則在此基礎上還具有更強烈的思想性和傾向性。兩所學校在中共的參與下，主導了其發展的方向。

香港淪陷前，中共有意識地將南下的文化界人士組織起來，雖然他們並不一定是中共黨員，但大多與中共各類秘密組織或中共黨員交往甚密，如金仲華、劉思慕、高天、楊奇等，均成為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的辦學主要力量。國民黨方面也意識到這一問題，國民黨軍委會辦公廳曾於1941年9月15日密電重慶衛戍總司令部，認為共產黨「文化界活動分子，近以香港為其文化工作之根據地，對於後方從事藝術宣傳工作之人員，多方誘惑其赴港，以期羅為己用。茲為謀有效之防制計，嗣後對於此類人員請求發給離渝執照，應請貴會轉飭主管機關嚴加限制，必須持有所屬機關正式證明檔，確係因公赴香港者方允發給。」（《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五輯第二編文化（二）》，1998：

239) 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的學生經過老師們的薰陶，也多在思想上傾向中共或左派思想。如唐葆華回憶，1940年秋，在中共的組織下成立了「一個以中國新聞學院第二屆部分學員為主、並有第一屆、第三屆部分學員參加，後來還吸收社會上要求進步的青年參加的愛國群眾組織」(唐葆華，1989：36) 政治經濟研究會。他們畢業後還組織起來，學習革命理論，反對國民黨政權。也有許多畢業生參加了中共在香港文藝界的組織「文通」、「文聯」、「文生」(葉有秋，1989)。

戰後的達德學院更是如此。首先，學員中有許多本身在思想上傾向中共。有的是「在蔣管區裡暴露了身份的革命分子和進步人士」(藍威，1992：106)，有的是「由於參加學生運動，遭到了國民黨的迫害，難於繼續」(李翼華，1996：279) 求學的中學生，大多數都是思想上本身傾向於中共的青年。其次，學校的創辦與發展與中共有千絲萬縷的聯繫。1946年6月中共在香港成立工作委員會，與左翼人士不約而同有了創辦大學的念頭，但由於中共無法公開活動，因此負責營運學校的主要是左翼民主人士，他們來自「農工」「民盟」和「民革」三大黨派(劉智鵬，2011：42)。第三，中共以各種學習小組的方式，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學員的思想。1947年初，達德學院黨組織更是根據中共南方局的決定，成立「新民主主義同志會」，後改成「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各團支部由黨支部直接領導。到1948年底在校團員已達180多人(香港達德學院北京校友會，1992：40)。第四，中共黨員參與授課，並在課程中加入政治思想學習的內容。如泰國民盟成員、原新加坡多家報社的特約記者鄭海鷗回憶，除了專業課外，還有張明生老師講授社會發展史，梁嘉老師講思想方法論，並要聽張鐵生老師講國際政治等基礎課(鄭海鷗，1996：263)。在他提到的這三位老師中，張明生、張鐵生都是達德學院校內黨組的成員(張明生、吳平、陳燕芳，1992：102)，梁嘉時任中共粵桂湘邊區工委書記，當時在香港(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2006：242)。這種政治教育是過去香港新聞學社、生活新聞學院所沒有的。

社會的需求是早期香港新聞教育發展演變的外在條件，而主辦者教育理念的演變則決定了新聞教育往甚麼方向發展。早期香港新聞教育的辦學理念，從最初的解決個人生計的職業教育，轉向以愛國、報

國為訴求的愛國報國教育，這種理念的變化，是與當時全中國的形勢發展息息相關的。尤其學員們共赴國難、參與國家構建的熱切期盼，都體現了香港參與國家發展的強烈願望。

開辦和關閉：與主辦者息息相關

香港早期新聞教育的開辦或關閉，與主辦者個人或團體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密切相關。香港新聞學社、生活新聞學院均為一群志同道合的報人自發開辦，然而無論是黃天石、關楚璞還是其他主要參與者，大部分為單純的報人或文人，即便在業內有一定名氣，但在政商兩界並無過人實力和影響。興辦新聞教育並不是僅憑有辦報經驗、行業人脈以及一腔熱情就能成功的，還需要方方面面的資源。尤其在動盪的社會中，一旦遇到主辦人變動或招生不足等無法預料的危機，抗風險能力不足的缺點使得新聞教育搖搖欲墜，最後只能關門大吉。這也是生活新聞學院、香港中華業餘學校乃至後來的民治新聞專科香港分校等開辦不足一年即自然結業的根本原因。

與之相反的是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和達德學院，自創辦時即十分注重吸納各種社會資源。香港中國新聞學院開辦時，除了有眾多報人和知識份子保證教學水準之外，還邀請政界元老許世英、社會賢達教育家陶行知任正副董事長，院長、副院長也是由香港當時實力頗為雄厚的《申報》、《星島日報》的兩位總編輯郭步陶、金仲華擔任。這種架構融政、商、學、報界於一體，加之背靠中國青年記者學會香港分會，得以從內地源源不斷的輸入人力資源，使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成為當時頗為穩定的新聞教育機構。達德學院更是戰後中共和左翼民主人士一個成功的合作專案(劉智鵬，2011：16)，既有中共周恩來、董必武的幕後推動，也有國民黨元老李濟深、彭澤民、何香凝、司徒美堂等的直接支持，還有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人民救國會、中國農工民主黨等重要成員參與(劉智鵬，2011：25，盧瑋鑾，1988：151)，愛國將領蔣廷黻更是慷慨借出別墅作為校舍。除此之外，各位校董每人負責募捐一千港幣以上，而首次募捐即籌集了大約兩萬元港幣，用於修葺校舍、購買教學設備等等(劉智鵬，2011：2)。

香港最早的新聞「夜校」最終均因招生不足、主辦者意興闌珊離港主動結束學校而告終，這顯然是與主辦者擁有的資源不足密切相關。而達德學院的關閉並非資源不足，而是因政治傾向過強被港英當局封閉。由於當時國共內戰大局已定，中共並無強化在香港影響力的打算，逐步將在香港的有分量的中共黨員和左翼民主人士送回內地，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甚至達德的許多學生也紛紛接受任務返回內地。無論教師或者學生，都視在香港的歲月為過渡時期，只要局面有利，他們都渴望返回內地為國家建設出一份力(劉智鵬，2011：159)。

結語

總體而言，隨著日本侵略中國的進程，以及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的發展，除香港淪陷的三年八個月之外，香港社會對新聞教育的需求與日俱增，一方面，隨著人口的遷徙，大量中文報紙創刊，來港求學的學生逐漸增多，另一方面，來香港避難的知名報人和知識份子增多，保證了師資的數量和品質。社會的動盪與各團體黨派的不同利益訴求，使得香港報業需要大量的新聞人才。另外，二戰後中共及左翼人士有意識在香港新聞教育中加入愛國報國教育，為戰後建立政權培養力量、儲備人才。

香港早期新聞教育也存在一些可以改進的問題。從香港新聞學社開始，一直到抗戰結束後的達德學院，從黃天石，到關楚璞，到唐碧川，到楊奇，還有在這一動盪時期多次離港返港的報人及知識份子，如對新聞教育有過深入思考、經驗豐富、德高望重的郭步陶等，他們的頻繁互動使香港早期新聞教育有著藕斷絲連的脈絡與傳承，也與內地新聞教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他們始終沒能建立起較為完善的新聞教育理論和實踐的框架體系，尤其如何把中國內地乃至國外的教學經驗和香港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統籌考慮師資隊伍的建設與培養等。但考慮到當時這些主辦者的過客心態以及與內地相比幾乎毫不落後的師資與課程設置，這與香港早期新聞教育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可謂瑕不掩瑜。

總而言之，早期香港新聞教育留下哪些痕跡，後來者如何看待它所留下的迴響，這些一直未受到應有的注意。尤其是港人近些年來一方面深入挖掘本土意識，一方面思索國家意識與認同的種種問題，香港新聞工作者更是對在外界影響下輿論收緊的種種表現感受愈發強烈。在這種情況下，對早期香港新聞教育的研究，將為我們提供一些值得參考的視角和值得反思的內涵。

註釋

- 1 一說為該校由侯曜任院長，於1938年新聞學院改為楊秋通訊社，1939年得杜其章相助，將楊秋通訊社改為「香港文化事業社」，杜其章為董事長，侯曜負責社務。見陳正茂(2011)，〈遭日軍殺害的戲劇家——侯曜〉，載《逝去的虹影：現代人物述評》(頁81–82)。台北：秀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2 該校開辦前三屆時名為中國新聞學院，復辦後兩屆名為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本文統稱香港中國新聞學院。

參考文獻

- 丁新豹(2005)。〈移民與香港的建設和發展——1841–1951〉。《歷史與文化：香港史研究公開講座文集》(頁41)。香港：香港公共圖書館。
- Ding Xinbao (2005). *Yimin yu xianggang de jianshe he fazhan — 1841–1951. Lishi yu wenhua: xianggangshi yanjiu gongkai jiangzuo wenji* (p. 41). Xianggang: Xianggang gonggong tushuguan.
- 王賡武(1997)。《香港史新編(上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 Wang Gengwu (1997). *Xianggangshi xinbian* (shangce). Xianggang: Sanlian shudian xianggang youxian gongsi
-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教育理論研究室《陶行知年譜稿》編寫組(1982)。《陶行知年譜稿》。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 Zhongyang jiaoyu kexue yanjiusuo jiaoyu lilun yanjiushi Tao Xingzhi nianpu gao bianxiezhu (1982). *Tao Xingzhi nianpu gao*. Beijing: Jiaoyu kexue chubanshe.
-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2006)。《解放戰爭時期敵遠後方遊擊戰爭·粵桂湘地區》。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Zhongguo renmin jiefangjun lishi ziliao shuxie bianshen weiyuanhui (2006).

- Jiefang zhanzheng shiqi diyuan houfang youji zhanzheng-yueguixiang diqu.*
Beijing: Jiefangjun chubanshe.
- 方駿、熊賢君主編(2008)。《香港教育通史》。香港：齡記出版有限公司。
- Fang Jun, Xiong Xianjun (Eds.) (2008). *Xianggang jiaoyu tongshi*. Xianggang: Lingji chuban youxian gongsi.
- 李少南(1997)。〈香港的中西報業〉。王廣武主編(1997)，《香港史新編(下)》(頁497-521)。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 Li Shaonan (1997). *Xianggang de zhongxi baoye*. Wang Gengwu (Eds.) (1997). *Xianggangshi xinbian xia* (pp. 497-521). Xianggang: Sanlian shudian xianggang youxian gongsi.
- 李建新(2003)。《中國新聞教育史論》。北京：新華出版社。
- Li Jianxin (2003). *Zhongguo xinwen jiaoyushi lun*. Beijing: Xinhua chubanshe.
- 李翼華(1996)。〈達德給了我什麼〉。達德學院校友會編，《達德學院建校五十周年紀念文集》(頁279)。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Li Yihua (1996). *Dade geile wo shenme*. Dade xueyuan xiaoyouhui (Eds.). *Dade xueyuan jianxiao wushi zhounian jinian wenji* (p. 279). Guangzhou: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 李谷城(2000)。《香港報業百年滄桑》。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 Li Gucheng (2000). *Xianggang baoye bainian cangsang*. Xianggang: Mingbao chubanshe youxian gongsi.
- 何賜樂(2010)。〈中業指引我走上共赴國難的光明大道〉。周佳榮、丁潔主編，《陶行知與香港「中業」教育》(頁28)。香港：書作坊。
- He Cile (2010). *Zhonghua zhiyin wo zoushang gongfu guonan de guangming dadao*. Zhou Jiarong, Ding Jie (Eds.). *Tao Xingzhi yu xianggang zhongye jiaoyu* (p. 28). Xianggang: Shuzuofang.
- 吳秉文(1996)。〈達德生活的回憶〉。達德學院校友會編，《達德學院建校五十周年紀念文集》(頁359)。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Wu Bingwen (1996). *Dade shenghuo de huiyi*. Dade xueyuan xiaoyouhui (Eds.). *Dade xueyuan jianxiao wushi zhounian jinian wenji* (p. 359). Guangzhou: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 林友蘭(1977)。《香港報業發展史》。台灣：世界書局。
- Lin Youlan (1977). *Xianggang baoye fazhanshi*. Taiwan: Shijie shuju.
- 林牧茵(2013)。《移植與流變——密蘇里大學新聞教育模式在中國(1921-1952)》。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Lin Muyin (2013). *Yizhi yu liubian—Misuli daxue xinwen jiaoyu moshi zai*

- zhongguo* (1921–1952).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 金城 (2002)。〈憶香港中華業餘學校的生活片斷〉。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教育》(頁662)。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 Jin Cheng (2002). *Yi xianggang zhonghua yeyu xuexiao de shenghuo pianduan. Quanguo zhengxie wenshi ziliao weiyuanhui* (Eds.). *Wenshi ziliao cunghao xuanbian. Jiaoyu* (p. 662). Beijing: Zhongguo wenshi chubanshe.
- 周佳榮、丁潔 (2010)。〈導論：陶行知·香港·中業教育〉。周佳榮、丁潔主編，《陶行知與香港「中業」教育》(頁9–10)。香港：書作坊。
- Zhou Jiarong, Ding Jie (2010). *Daolun: Tao Xingzhi · Xianggang · zhongye jiaoyu. Zhou Jiarong, Ding Jie* (Eds.). *Tao Xingzhi yu xianggang zhongye jiaoyu* (pp. 9–10). Xianggang: Shuzuofang.
- 俞旭、朱立、朵志群 (1998)。〈香港四所院校新聞教育之比較〉。《新聞與傳播研究》第1期，頁23。
- Yu Xu, Zhu Li, Duo Zhiquan (1998). *Xianggang sisuo yuanyao xinwen jiaoyu zhi bijiao.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1, 23.
- 香港達德學院北京校友會編 (1992)。《達德學院的教育實踐》。北京：群言出版社。
- Xianggang dade xueyuan Beijing xiaoyouhui (Eds.). *Dade xueyuan de jiaoyu shijian*. Beijing: Qunyan chubanshe.
- 〈軍委會辦公廳關於嚴加限制文化界人士購機票飛港活動的代電 (1941年9月15日)〉 (1998)。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五輯第二編文化 (二)》(頁239)。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Junweihui bangongting guanyu yanjia xianzhi wenhuajie renshi gou jipiao feigang huodong de daidian (September 15, 1941) (1998). *Zhongguo dier lishi dang'anguan* (Eds.). *Zhonghua minguoshi dang'an ziliao huibian diwuji dierbian wenhua er* (p. 239). Nanjing: Jiangsu guji chubanshe.
- 唐葆華 (1989)。〈「政經會」對我們的培育——回憶香港「政治經濟研究會」〉。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校友會編印，《今昔依依》，頁36。
- Tang Baohua (1989). *Zhengjinghui dui women de peiyu—huiyi xianggang zhengzhi jingji yanjiuhui. Xianggang zhongguo xinwen xueyuan xiaoyouhui* (Eds.), *Jinxi yiyi* (p. 36).
- 唐錫良、鄭壽稠 (1992)。〈報界名人唐碧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恩平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恩平文史專輯 港澳台恩平人》，頁12–13。
- Tang Xiliang, Zheng Shouchou (1992). *Baojie mingren Tang Bichuan. Zhongguo*

- renmin zhengzhi xieshang huiyi Guangdongsheng enpingxian weiyuanhui
wenshi ziliao yanjiu weiyuanhui (Eds.). *Enping wenshi zhuanji gang'aotai
enpingren* (pp. 12–13).
- 徐潤儉(2010)。〈「中業」復校概況〉。周佳榮、丁潔主編，《陶行知與香港「中
業」教育》(頁51)。香港：書作坊。
- Xu Runjian (2010). Zhongye fuxiao gaikuang. Zhou Jiarong, Ding Jie (Eds.). *Tao
Xingzhi yu xianggang zhongye jiaoyu* (pp. 51). Xianggang: Shuzuofang.
- 鄧善熙(2009)。〈祖父鄧稚援為梅蘭芳首次訪港演出寫長詩〉。《縱橫》第7期，
頁35。
- Deng Shanxi (2009). Zufu Deng Zhiyuan wei Mei Lanfang shouci fanggang yanchu
xie changshi. *Zongheng*, 7, 35.
- 蔡自新(1994)。〈香港中華業餘學校的創辦與結束〉。廣州市東山區政協學習
文史資料委員會，《東山文史資料(第3輯)》，頁49。
- Cai Zixin (1994). Xianggang zhonghua yeyu xuexiao de chuangan yu jieshu.
Guangzhoushi dongshanqu zhengxie xuexi wenshi ziliao weiyuanhui,
dongshan wenshi ziliao (di 3 ji), p. 49.
- 喬青(2010)。〈憶「中業」早期創校經過〉。周佳榮、丁潔主編，《陶行知與香港
「中業」教育》(頁31–32)。香港：書作坊。
- Qiao Qing (2010). Yi zhongye zaoqi chuanguang xiao jingguo. Zhou Jiarong, Ding Jie
(Eds.). *Tao Xingzhi yu xianggang zhongye jiaoyu* (pp. 31–32). Xianggang:
Shuzuofang.
- 葉德偉(1982)。〈淪陷前夕港軍的防衛情況〉。葉德偉等編著，《香港淪陷史》
(頁28)。香港：廣角鏡出版社。
- Ye Dewei (1982). Lunxian qianxi gangjun de fangwei qingkuang. Ye Dewei et al.
(Eds.). *Xianggang lunxianshi* (p. 28). Xianggang: Guangjiaojing chubanshe.
- 夏衍(1987)。〈白頭記者話當年——記香港《華商報》〉。南方日報社、廣東《華
商報》史學會合編，《白首記者話華商——香港《華商報》創刊四十五周年
紀念文集1941–1986》(頁3)。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Xia Yan (1987). Baitou jizhe hua dangnian — ji xianggang huashangbao. Nanfang
ribaoshe, Guangdong huashangbao shixuehui (Eds.). *Baishou jizhe hua
huashang — xianggang huashangbao chuankan sishiwu zhounian jinian wenji
1941–1986* (p. 3). Guangzhou: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 陸詒(1983)。〈回憶香港《光明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
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八十九輯)》(頁141)。北京：文
史資料出版社。

- Lu Yi (1983). Huiyi xianggang guangmingbao. Zhongguo renmin zhengzhi xieshang huiyi quanguo weiyuanhui wenshi ziliao yanjiu weiyuanhui (Eds.). *Wenshi ziliao xuanji (di 89 ji)* (p. 141). Beijing: Wenshi ziliao chubanshe.
- 陸詒 (1994)。《文史雜憶》。上海：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編輯部。
- Lu Yi (1994). *Wenshi zayi*. Shanghai: Shanghaishi zhengxie wenshi ziliao bianjibu.
- 陸詒 (1996)。〈發揚達德的好傳統〉。達德學院校友會編，《達德學院建校五十周年紀念文集》(頁248)。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Lu Yi (1996). Fayang dade de hao chuantong. Dade xueyuan xiaoyouhui (Eds.). *Dade xueyuan jianxiao wushi zhounian jinian wenji* (p. 248). Guangzhou: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 張明生、吳平、陳燕芳 (1992)。〈回憶達德學院黨團組織活動〉。香港達德學院北京校友會編，《達德學院的教育實踐》，北京：群言出版社，頁102。
- Zhang Mingsheng, Wu Ping, Chen Yanfang (1992). Huiyi dade xueyuan dangtuan zuzhi huodong. Xianggang dade xueyuan Beijing xiaoyouhui (Eds.). *Dade xueyuan de jiaoyu shijian* (p. 102). Beijing: Qunyan chubanshe.
- 麥勁松 (1994)。〈回憶杜啟芝〉。《情繫中新——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創建55周年紀念文集》，頁131。
- Mai Jinsong (1994). Huiyi Du Qizhi. *Qingxi zhongxin—xianggang zhongguo xinwen xueyuan chuangjian 55zhounian jinian wenji*, 131.
- 〈教育部關於調查整頓私立民治新聞專科學校檔 (1944年9–10月)〉 (1997)。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五輯 第二編》(頁837)。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Jiaoyubu guanyu diaocha zhengdun sili minzhi xinwen zhuanke xuexiao dang (1944nian 9–10yue) (1997). Zhongguo dier lishi dang'anguan (Eds.). *Zhongguo mingushi dang'an ziliao huibian diwuji dierbian* (p. 837). Nanjing: Jiangsu guji chubanshe.
- 黃苗子 (2001)。〈香江之戀——記我的童年之二〉。《青燈瑣記》。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
- Huang Miaozi (2001). Xiangjiang zhi lian—ji wode tongnian zhier. *Qingdeng suoji*. Beijing: Dazhong wenyi chubanshe.
- 《華商報》(1941年9月2日)。〈香港青年記者學會昨隆重紀念記者節 溫莎茶會中參加者達二百餘人 范長江等分別懇切致辭互助勉〉，第4版。
- Huashangbao (September 2, 1941). Xianggang qingnian jizhe xuehui zuo longzhong jinian jizhejie wensha chahuizhong canjiazhe da erbai yuren Fan Changjiang deng fenbie kenqie zhici hu zhujian, di 4 ban.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39期(2017)

《達德歲月》編委會(2004)。《達德歲月：香港達德學院紀念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Dade suiyue bianweihui (2004). *Dade suiyue: Xianggang dade xueyuan jinianji*. Guangzhou: Zhongshan daxue chubanshe.

楊文炎(1994)。〈默默奉獻的風範——悼念黎士英同學〉。《情繫中新——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創建55周年紀念文集》，頁125。

Yang Wenyan (1994). Momo fengxian de fengfan—daonian Li Shiyong tongxue. *Qingxi zhongxin—xianggang zhongguo xinwen xueyuan chuangjian 55zhounian jinian wenji*, p. 125.

楊國雄(2010)。〈傑克：擅寫言情小說的報人〉。《文學評論》第11期，頁57。

Yang Guoxiong (2010). Jie Ke: Shanxie yanqing xiaoshuo de baoren. *Wenxue pinglun*, 11, 57.

《華商報》(1941年6月23日)。〈脫離總會組織關係 青年記者學會改變名稱 經五分之四會員贊同 華民政務司准予備案〉，第4版。

Huashangbao (June 23, 1941). Tuoli zonghui zuzhi guanxi qingnian jizhe xuehui gaibian mingcheng jing wufenzhisi huiyuan zantong huamin zhengwusi zhunyu beian, di 4 ban.

葉有秋(1989)。〈光，總是要放射的！記「中新」第四屆同學參加的革命文藝活動〉。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校友會編印，《今昔依依》，頁48。

Ye Youqiu (1989). Guang, zongshi yao fangshe de! Ji zhongxin disiji tongxue canjia de geming wenyi huodong. *Xianggang zhongguo xinwen xueyuan xiaoyouhui* (Eds.). *Jinxi yiyi* (p. 48).

藍威(1992)。〈崢嶸歲月 難忘的日子——憶香港達德學院的學習生活和革命活動〉。香港達德學院北京校友會編，《達德學院的教育實踐》。北京：群言出版社，頁106。

Lan Wei (1992). Zhengrong suiyue nanwang de rizi—yi xianggang dade xueyuan de xuexi shenghuo he geming huodong. *Xianggang dade xueyuan Beijing xiaoyouhui* (Eds.). *Dade xueyuan de jiaoyu shijian* (p. 106). Beijing: Qunyan chubanshe.

鍾華(1991)。〈香港中國新聞學院〉。鍾紫主編，《香港報業春秋》(頁146)。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Zhong Hua (1991). *Xianggang zhongguo xinwen xueyuan*. Zhong Zi (Eds.). *Xianggang baoye chunqiu* (p. 146). Guangzhou: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顧執中(1981)。〈上海民治新聞專科學校的誕生與成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新聞研究資料》編輯室，《新聞研究資料一九八一年第五輯(總

- 第十輯)》(頁199、205–206)。北京：新華出版社。
- Gu Zhizhong (1981). Shanghai minzhi xinwen zhuanke xuexiao de dansheng yu chengzhang.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xinwen yanjiusuo xinwen yanjiu ziliao bianjishi, *xinwen yanjiu ziliao yi jiu ba yi nian diwuji (zong di 10 ji)* (pp. 199, 205–206). Beijing: Xinhua chubanshe.
- 鄭海鷗 (1996)。〈教、學、做合一的新聞班〉。達德學院校友會編，《達德學院建校五十周年紀念文集》(頁263–264)。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Zheng Haiou (1996). Jiao, xue, zuo heyi de xinwenban. Dade xueyuan xiaoyouhui (Eds.). *Dade xueyuan jianxiao wushi zhounian jinian wenji* (pp. 263–264). Guangzhou: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 羅文輝 (1989)。〈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對中華民國新聞教育及新聞事業的影響〉。《新聞學研究》第四十一集，頁201–210。
- Luo Wenhui (1989). Misuli daxue xinwen xueyuan dui zhonghua minguo xinwen jiaoyu ji xinwen shiye de yingxiang. *Xinwenxue yanjiu*, 41, 201–210.
- 盧瑋鑾 (1988)。〈達德學院的歷史及其影響〉。香港達德學院校友會福建分會編，《達德研究文集》(頁150–158)。
- Lu Weiluan (1988). Dade xueyuan de lishi jiqi yingxiang. Xianggang dada xueyuan xiaoyouhui Fujian fenhui (Eds.). *Dade yanjiu wenji* (pp. 150–158).

本文引用格式

- 劉書峰 (2017)。〈從職業教育到愛國報國教育：香港早期新聞教育研究 (1927–1949)〉。《傳播與社會學刊》，第39期，頁189–219。